

十月革命对 中国革命的影响

丁守和、殷叙彝、張伯昭著



十月革命对 中国革命的影响

（苏俄、中国、日本）

（苏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日本）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丁守和、殷叙彝、張伯昭著

名
紅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2622/08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丁守和、殷叙彝、張伯昭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5\frac{3}{4}$ · 插页4 · 字数113,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0 定价(7) 0.65元

统一书号11001·161

封面设计者：牟紫东 校对者：良荣娟等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中国	3
一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	3
二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16
三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26
第二章 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 傳播	38
一 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	38
二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傳播	59
三 与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	83
第三章 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結 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13
一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	113
二 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結合	134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164

前 言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偉大的新时代，給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階級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中国人民对于十月革命的偉大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有着亲切的体会和深刻的理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極其广闊、極其深远的。它引起了中国人思想的大变化，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革命运动發展的方向。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工人階級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并把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就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逐步地走向了胜利。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們打算对于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在中国傳播开来；中国的先进知識分子怎样从民主主义立場轉变到共产主义立場，确定了走俄国人的道路；中国工人階級怎样开始了由自在階級到自为階級的轉变，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怎样結合起来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过程，做一些具体的研究，以便从中看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發展的偉大而深刻的影响。

* * *

在写作本書过程中，曾得到作者所在单位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的同志們在收集資料方面的帮助，并且也得到其他机关、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謝。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中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所發生的偉大影响，是通过中国社会的内部条件而起作用的。毛澤东同志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創了俄国历史的新紀元，而且开創了世界历史的新紀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別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准备下了迅速接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条件。

一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敗

中国近代史开端于十九世紀上半叶。1840年鴉片战争之后，当中国社会經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尚未来得及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轉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便逐步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剝削，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政治、經济和文化的发展，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統治者，爭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前仆后继地进行了不屈不撓的

^① 毛澤东：“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91頁。

英勇斗争。因此，中国的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历史。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就掀起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一革命斗争坚持了十五年之久，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十七个省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但是，由于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农民究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此不可能提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科学的革命纲领，也不可能建立严格的革命纪律，以便团结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强大的敌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终于失败了。太平天国及同时的其他农民起义的失败说明了缺乏先进思想和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是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力量的。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必须重新学习，向先进国家寻找救中国的真理，才能在新的思想指导下，以新的方式展开新的斗争。

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同样是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和清朝政府的无耻媚外，中国的主权连续丧失，特别是在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的迹象日益显著，因而使得上层士大夫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摆脱现状的要求，逐渐形成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民族工业已

有了初步發展的条件下，他們企圖通过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來發展民間企業，以達到中國的富強。當時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主義者希望中國能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因此他們積極地為實現君主立憲這一目標而努力奮鬥，辦法就是爭取皇帝及掌握大權的官僚們的贊助。但是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既然非常微弱，而改良主義者又對當時各地的農民起義採取仇視的態度，因此，維新派缺乏有力的社會力量的支持，也就不能戰勝頑強的封建勢力。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宣告了改良主義在中國的破產，使得中國先進的愛國分子轉向了革命的道路。

繼之而起的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孫中山學習法國和美國革命的經驗，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綱領。當時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抱著這種理想，團結在同盟會的組織之下，奮不顧身地進行了各種革命活動，終於在1911年發動了武昌起義，在一部分工人、農民及城市下層群眾的熱烈支持下，推翻了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

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最高峰。它結束了長期統治中國的封建帝制，確定了“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①，被封建專制奴役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民第一次被宣布為國家的主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舊觀念已被拋棄，人民群眾再不認為

①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677頁。

“天子”——皇帝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神聖偶像了，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的覺醒。这是辛亥革命的
重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階級的代表袁世凱的妥协，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基础，沒有能够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走上資本主义独立發展的道路，革命終于失敗了。

辛亥革命对它的領導者民族資产階級是一个重大的考驗，这次革命开始暴露了中国資产階級的两重性的特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資产階級革命派勇敢地領導了这次革命，表現了高度的革命積極性；但更多的新从官僚地主階級轉化出来的資产階級上層分子却一方面对清政府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又惧怕革命的發展会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因此他們在清帝退位以后，便極力反对革命的繼續进行，并和軍閥封建势力勾結起来，成为反革命的幫凶。同时，即使是資产階級的革命民主派也暴露了它的軟弱性和妥协性，他們沒有懂得要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須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統治，沒有也不敢發动和組織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的急进民主主义的土地綱領，但並沒有想用这一綱領動員广大的农民群众去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以便摧毁封建主义的統治基础。革命党人虽然在联合会党和士兵工作中做了很大的努力，却沒有注意到广大农民中所蘊藏的深厚的革命力量，沒有在农民中进行深入的工作。因此，要进行全国范围的革命，主觀力量就过于薄弱，不得不依靠妥协派的地主

資產階級反清分子作为同盟軍，結果就打乱了革命的陣綫。此外，在思想戰綫上也沒有进行深入的理論工作来击破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堡垒，使得政治革命缺乏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为必要的前驅和后衛，同时也不能用明确的革命理論来巩固和武装革命者队伍的本身。总之，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他們沒有力量領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取得徹底的胜利。辛亥革命的失敗，宣布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破產，也說明了十八世紀法国革命的道路根本不适用于二十世紀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人民必須从失敗中吸取教訓，更进一步地覺醒，向更好的榜样學習新的革命經驗，走新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繼續加深的时期，中国处在一次新的革命風暴的醞釀阶段。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法国式的議會政府，实际上資產階級革命派所爭得的仅仅是一个起着資產階級民主制宪法作用的“元年約法”和根据这个約法产生的国会。但是，既然国家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軍閥官僚手里，作为整个封建制度上層建筑的軍閥官僚政治机构絲毫沒有改变，那么处在这种条件下的“約法”就只能是一紙空文而已。正像当时人所描写的：“官僚以刷新政治相期許，于是帝政未叶之官僚，一变而为共和開幕之官僚，臣服一姓之官僚，一变而为国民公仆之官僚。究之，人犹人，官犹是官，即政治亦就是政治。其所改革者，位阶职务之名称，簿書文告之程式，而其所不可改革者，即为官吏之个人。”① 資產階級並沒有掌握政权，个别的資產階級自由派

分子参加了政府，也不过是充作軍閥政府的点綴物而已。民国成立后，在北京很快地出现了許多政党，但这些所謂政党多半是官僚政客投机分子假借民主招牌进行爭权夺利的工具，他們連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能代表。在一本历史書上曾这样写过民国初年的政党情况：“中国政党初無异于政治学会，党綱空泛籠統，而以人中心，党员多無一定之主見，而以利害权利为轉移，或脫离甲党，或加入乙党，或另組党，極变化之神技。……政客唯利是視，不顧利害，不知輕重，不擇手段，破坏叫囂，大为識者良民所恶。”^①根据約法所选出之国會議員，本来就被官僚豪紳壟斷，根本不能代表人民。但即使这样的国会，也不能在軍閥专政的局面下长期存在，到了1914年初，約法就被袁世凱取消，国会也被解散。在討袁战争之后，旧国会仅仅恢复了一年，又被段祺瑞解散，而代之以清一色的段系分子組成的“新国会”，国会完全成为軍閥統治的御用工具了。省的議會也是完全掌握在地方軍閥官僚們的手中。議會政治的徹底失敗說明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破产。至于“約法”上規定的人民各項权利，更是形同虛文，軍閥們一方面在口头上也高談着共和、民主，一方面却肆無忌憚地封閉報館，扞制言論，禁止人民过問政治，而对于罢工工人更是格杀勿論。在“民国”政府的統治下，人民仍然沒有絲毫的民主权利。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对外取得民族独立，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不

① 詹父：“个人之改革”，“东方杂志”，十卷十二号，1914年6月。

② 陈燕祿：“中国近代史”，第709頁。

但絲毫沒有爭回失去的主權，反而進一步陷入殖民地的深坑。反動的北京軍閥政府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惜大批拍賣國家的主權來取得帝國主義的歡心。袁世凱一上台後，就以承認日本在滿蒙、帝俄在外蒙、英國在西藏的特權，換得了帝國主義的承認。他為了鎮壓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和消滅國民黨的殘余軍事力量，又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鎊的巨額貸款，把中國政府的財政完全置於五國銀行團的監督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早就有獨占中國的野心，因此便趁著西方帝國主義正忙於大戰，無暇東顧的機會，借口對德宣戰，武力佔領了中國的青島和山東的膠濟路沿綫地方，接著又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而有着強烈的皇帝欲望的袁世凱為達到早日登極稱帝的目的，一方面同美帝國主義勾結，同時也就不顧一切地承認了“二十一條”，幾乎把中國的主權出賣淨盡，以取得日本的支持。這個條約實際上是要把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附庸。

在作為帝國主義列強代理人的袁世凱倒台之後，日本就把當時掌握軍政大權的軍閥段祺瑞首先收買到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獨自豢養的走狗。日本對段祺瑞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而使得段祺瑞完全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僅僅在1917—1918年兩年之間，日段所簽訂的貸款契約就達五億日元以上，這就是有名的“西原大借款”。作為借款的代價是中國東北的鐵路、金礦、森林，華北的濟順、高徐二路的建築經營開採權，青島和膠濟路的駐兵權和管理權，以及全國的有綫電信和無綫電信的建設管理權等。1918年段祺瑞又和日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

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这样，就把中国軍隊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日本派軍官訓練中国軍隊，日本軍隊可以借“共同作战”为名开进中国境内，并且可以指揮中国地方官吏，而中国軍隊又必須以仆从国軍隊身份跟着进攻苏联的日本軍隊后面搖旗呐喊。这两个条約的簽訂是比“二十一条”更为重大的国耻。作为袁世凱得意門生的段祺瑞在卖国的手段上确是“青出于藍”的，而这时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深侵略下也就危在旦夕了。

民族資產階級想在辛亥革命后把中国改造成为資本主义国家的願望完全落空了。資產階級認為，在辛亥革命以后民主政治已經實現，中国資本主义的繁荣發展时代已經到来。于是他們在發展實業方面表現了很大的積極性，当时成立了很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業建設会”、“工業建設会”、“中华實業团”、“民生团”、“經濟协会”及各省的“實業协会”等。在“工業建設会發起趣旨”中写道：“往者憂世之士，亦尝鼓吹工業主义以挽救时艰而無效也，則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業之發达，……今茲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設我新社会，以竞胜爭存，而所謂產業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①但是資產階級的欢欣未免太早了，中国資本主义并不是从此获得了暢行無阻的發展，相反是遭遇到更大的灾难。从二十世紀以来，世界資本主义的發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必須进一步侵占和掠夺落后国家，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壟断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0—867頁。

資本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成為金融寡頭的投資場所。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者爭相在中國築路、設廠、開辦銀行以至劃分勢力範圍，正是說明了這一趨勢。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列強經濟侵華的方式還是以商品傾銷為主，至於大舉來華設廠，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這在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史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本是从棉紡織業起家的，在大戰時期的所謂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首先獲得飛躍發展的也是棉紡織業，而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勢力最厚、使中國民族資本受害最深的正是棉紡織業。單从商品輸出方面，也可以看到日貨向中國傾銷的逐步加緊，在1902—1912年這十年間，日本向中國輸出的商品價值額由72,751,792兩仅仅增加為81,425,408兩，而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年，就一躍而為148,729,099兩^①。在歐戰期間，日本更進一步在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設廠，从紗錠數目上看，日本在華紗廠的機器設備在1913年為111,936錠，1919年為332,922錠，到了1922年就增加為621,828錠，九年之間發展將近六倍^②。随着政治上軍事上侵略的加深，這時在中國棉布市場上也就確立了日貨的獨占地位。中國民族資本雖然也利用歐戰的時機急起直追，並且在紗錠的絕對數上始終多於日本紗廠的錠數，但實際上是遠不及日本棉紡織業的在華勢力的。日本的壟斷資本差不多壟斷了中國全部棉花進出口貿易和中國國內的棉產販

① 以上數字材料引自千家駒：『鴉片戰爭後的國民生計問題』，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三卷一期。

②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77頁。

运事業，并且还掌握了許多地方的棉花生产。在这样一个完全“自由”的投資場所，讓中国幼弱的民族資本去和帝国主义龐大的壟断資本进行竞争，根本是不可能的；何况在中国的軍閥买办的黑暗統治下，外国資本有种种优待，貨品暢銷無阻，而民族工業則受重稅盘剝，由原料运出直到制成品运到銷售地，中間所經的“出产”、“落地”、“銷場”、“出口”、“常关”、“入省”等等关卡厘金，名目繁多，不可胜数。当时外国在华紗厂的盈利率，像英国怡和、公益和日本的上海紡織可以高达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以上^①，而中国紗厂即使处在这“黄金时代”，停工、倒閉和被外厂吞并的也屢見不鮮。棉紡織業是这样，其他輕工業也是这样，至于重工業方面，更是沒有民族資本插足的余地。很多人在当时已經預見到，欧战期間中国資本主义的迅速發展只是暫时的，即使中国不会淪为日本一国的殖民地，而当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时候，幼稚的中国民族資本也仍然会瀕于絕望。现实情况說明了企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现資本主义工業化是完全不可能的，所謂“实業救国”仅不过是一种幻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資本主义的初步發展遇到了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封建势力的野蛮剝夺，于是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国人民的生活在这时更陷入了悲慘的境地。随着帝国主义經濟侵略的深入，及其进一步与商業高利貸資本相結合，加速了中国自給自足經濟的瓦解。广大的农民和手工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册，第389—390頁。